

Aesthetics and Marxism

马克思主义 与美学



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和他们的西方同行

〔美〕刘康 著 李辉 杨建刚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马克思主义与美学

Aesthetics and Marxism

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和他们的西方同行

〔美〕刘康 著 李辉 杨建刚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与美学: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和他们的西方同行/(美)刘康著;李辉,杨建刚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

ISBN 978-7-301-17852-2

I. ①马… II. ①刘… ②李… ③杨… III. ①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国 IV. ①B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9336 号

书 名:马克思主义与美学——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和他们的西方同行

著作责任者:[美]刘康著 李辉 杨建刚译

责任编辑:任慧

封面设计:海云书装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7852-2/G·2961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ku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67315

印 刷 者:三河市博文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16.25 印张 230 千字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中文版前言

本书写作的时间是1995—1996年,2000年由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2010年翻译成中文。到与中国读者见面,已经过去了十几年了。美学、马克思主义当然是本书讨论的内容,但这本书的主题是中国现代思想史,特别是跟马克思主义有关联的文化思想和理论。对我而言,这本书的价值是记录了我从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学术思考的轨迹,也多少反映出我这代80年代初期出国留学的人文社科领域学者所关注的问题。

我上大学的时代,中国刚刚脱离了“文革”,正处于拨乱反正、开启思想解放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人文社科进入了一个新启蒙时期,也是一个非常重视文科的时期,人文社科是当时思想解放的中心舞台。当时的中国学术界翻译兴盛,译介开路,借用西方之话语,议中国之问题。大家对西方思想如饥似渴,全盘接受,也不管消化还是不消化,形成了80年代的一个热闹的场景。

我去了美国以后马上发现,西方国家跟中国人文学术相比,有两大反差。第一个反差是美国学术界当时正在酝酿一场思想革命。这一点中美当时还是比较像的,文化思想学术都在革命的风暴中,但是思想的导向反差很大。西方的学术当时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向“左”转。而中国正处于

一个混乱的时期,是对“左”的否定的时期,当然也没有完全的否定,而是用“左”的思路,“左”的语言和“左”的方法来反对左,并没有形成自己的思路。第二个非常大的反差是,美国学术虽然有求新的一方面,但已经形成了一个很严谨的学术规范,这是中国所完全没有的。

我从事学术研究的目的是关注当代中国的问题。一方面我开始关注西方的汉学,西方汉学那时开始大量地进入到中国,包括许多华裔学者如余英时、林毓生等人,我在美国直接接触他们,很快摸清了他们的思路。我的目标非常明确,汉学里面有很多复杂的东西,可以判断其中有没有价值,对中国有无意义。另一方面,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这些新锐思潮当时在美国正在兴盛,即将占主导地位。它们的影响从比较文学开始,蔓延到整个文科。我也直接参与到了这个过程中,这是非常幸运的事情,并且很快就找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这跟某些学者有关。我到美国之后读了杰姆逊的书,并由他生发,把西方的理论脉络延伸开来,由点开面,很快找到了研究方向。

我找到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思想的结合点,即中国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莫斯科加延安的模式。西方学术界没有看到这一模式的复杂性,没有看到莫斯科的影响,只看到了延安模式。延安思想,也就是毛泽东思想,变成了一种革命的普世价值,进入了西方的左翼思想体系之中。这是有深厚的文化历史原因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左翼社会运动的兴起,与中国“文革”有深刻的渊源。我在美国读书时,中国正在反思批判“文革”。我经历了很大的思想转换,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在否定“文革”的时候,不应该从一个急功近利的角度,而应该上升到抽象和普世意义的角度,来思考为什么要否定激进思想。这个时候我就选定了一个题目,即莫斯科—延安模式中的延安模式,毛泽东思想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激进思潮的关联性,以此为核心,开始我最早的学术思路。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从它们的纠结出发,对中国的现代性、现代化问题进行重新认识。

我们通常所讲的现代化模式是目前占支配地位的西方资本主义模

式,简称欧美模式,核心价值是自由市场、多党制民主、公民社会、中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等,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到意识形态,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是苏联的斯大林模式,起源于马克思、国际共运和列宁主义。他们力图找出一条现代化不同选择的道路。但是很可惜斯大林模式没有真正跨越西方主导的现代化的窠臼。在政治上苏联强化了党的专制政体,经济上采用计划经济,意识形态上崇尚集体主义,社会管理上是阶级斗争,与欧美模式完全是对着干,但并未找出第三条路。而且苏联与西方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一方面要进入西方,一方面又要脱离西方,实际上主要还是想要进入西方。莫斯科模式没有根本脱离西方的体系。

这个时候延安模式就有一点别出蹊径的样子。中国是一个东方农业社会。毛泽东设想的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不是一个产业工人领导的都市暴动的道路,而是一条农民革命的道路。毛泽东是个农民,同时也是一个书生,他的资源是农民和文化。毛泽东是靠农民和意识形态来实现中国革命的。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中国革命用了两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枪杆子主要指农民,笔杆子指意识形态。这一点看起来与西方模式完全不同,跟斯大林模式也不一样。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化的道路问题很苦恼,陷于西方资本主义和苏联模式之间。他们批判西方和苏联模式,找寻现代性道路之间的区别,但没有成功。最后他们发现了毛泽东。他们认为经济决定论、国家主义是导致斯大林模式走向僵化的原因,所以他们认为从文化、审美、意识形态等精神层面来找寻出路。就这样,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找到了毛泽东。但是他们对中国的情况了解得比较片面,想象成分比较大。虽然其中有些人思想敏锐,能从根本问题出发,高度抽象地去构建体系,但是一旦遇到现实问题往往还是搞不清楚,迷失方向。比如阿尔都塞的理论概括能力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里至高无上,但是他一旦遇到现实的问题,比如中国模式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就搞不清了,尤其对“文革”以及中国为什么要否定“文革”,有很深的误解。在这种情况下,问题的关键不是中国对西方有什么吸引力,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

“发现”了中国,他们认为中国提供了现代化的第三条路。我们通过他们的视野来看中国,用他们的观点来看中国,能不能看出中国存在什么样的问题?现在中国存在各种思路,广义的自由主义全盘否定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甚至试图重写历史。而以比较僵硬的、延安—莫斯科模式的意识形态看待中国问题,也有一套理论体系。有没有一套从西方左翼的观点来看中国的方法?我觉得他们之间的对接是可能的,我就想找这样的一种对接。

中国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是对欧洲中心论的挑战;反过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又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身上看到了这种挑战,同时又用来反省自身。这个问题讲起来逻辑关系非常复杂,但是仔细想起来又不是那么复杂,它们是搅合在一起的东西,它们的影响很难把握,实际上又无所不在。我这本书就是想把我讲的这几种关系梳理一下,对中国现代性和中国现代化的不同选择进行学术上的探讨。意识形态革命和农民革命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特征,这本书的主要目的也就是想讲这两个东西。

从内容上来说,我的研究有历史的对象,前面小部分内容是讲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鲁迅,后面小半部分内容涉及胡风、朱光潜、李泽厚、刘再复,中间的核心部分是讲瞿秋白和毛泽东。这本书的中心和核心部分,就是讨论瞿秋白和毛泽东的延安—莫斯科模式。我认为这两个人是一种二重唱的关系,这是我的看法。就我所知,现在还没什么人认为他们在思想上有承续关系,也没人认为他俩在思想上可以构成同等的地位。但是我始终认为这两个人在探索中国的发展道路上是异曲同工的。瞿秋白的巨大贡献是从怀疑到否定莫斯科模式。他是真正的莫斯科代表,比王明、李立三等人更有发言权。瞿秋白是以记者的身份进入苏联采访的,他是一个激进的革命青年,没有具体的利益,他在苏联是处于这样一个位置,他站在外面(中国)看苏联。另外他还进去(苏联)了,他参加了几个重要的大会,中共四大、五大,主持了六大,当过中共的领袖。他对莫斯科模式非常了解,但是最终他又走出来了。而王明、博古、李立三进去了没

出来,还有一些人如康生等人一辈子在搞政治。毛泽东与他们完全不同,毛泽东完全是走自己的路,他在井冈山时代就开始对抗莫斯科模式,后来发展出了延安模式。可以看到,从莫斯科模式到延安模式是一个历史轨迹。仅仅有延安模式也不会产生后来的中国马克思模式,仅仅有莫斯科模式也不会产生中国马克思模式,正因为有了瞿秋白和毛泽东,才有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延安—莫斯科模式,这是我的一个核心观点。在这个过程中我又特别掺入了一个西方特别有创新思想的人物——葛兰西,葛兰西可以作为毛泽东和瞿秋白的最大的参照系。如果说我这本书有什么创新之处的话,就是葛兰西是瞿秋白和毛泽东的参照系,瞿秋白和毛泽东共同探讨出了延安—莫斯科模式。

关于瞿秋白与毛泽东的关系,抛去他的政治参与不谈,从他对革命的认识层面来看,我认为瞿秋白是毛泽东思想上的向导和引路人。瞿秋白认为中国不能走西方的道路,五四的道路、全盘西化的道路、莫斯科模式在中国是走不通的,中国必须走大众化的、本土化的、农民的道路,要走农民文化革命的道路。只有改变农民的思想,中国革命才能走出自己的道路,这就是瞿秋白最后达成的一种认识,被毛泽东发挥成一整套的思想体系。我的这本书,谈的不是李泽厚意义上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而是毛泽东与瞿秋白的双重变奏,他们对中国、全世界的影响我认为是不亚于葛兰西的。

瞿秋白留下了丰富的著述,他的很多文章是非常系统的,有政治宣言、文件、文学散文、文艺评论等。与他同时代的葛兰西,是意大利共产党的领袖,革命失败后被长期关在法西斯牢房里,写了许多笔记。乍一看他的文字乱糟糟的,好像是疯子在呓语。但后来阿尔都塞、福柯等对葛兰西的遗稿做了一个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意义上的重新解释和发掘。葛兰西的思想终于重新被发现,得以闪光。葛兰西是20世纪对人类思想产生很大的影响的人物。但为什么瞿秋白没有做到?因为他不在西方强势的话语内。中国当代的人文社科研究相对不受重视,这是中国的一个错位。西方六七十年代同样浮躁,也处于转型的时期,高科技层出不穷,后工业

社会取代前工业时代,美国也正在向金融化、信息化转型。这个转型空前巨大,绝对不亚于当前的中国。但是他们保留有一块学术的净土,坚守住了,他们的学术和思想没有浮躁。所以就有一大批学者,把那些发黄的、发霉的东西,把不被人理解的、乱糟糟的葛兰西笔记整理出来,进行发掘和解读。葛兰西研究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学术界对葛兰西的研究是从英国开始的,然后是法国,最后扩展到全世界。对葛兰西研究做出最大贡献的是阿尔都塞和威廉斯,追根溯源是阿尔都塞。

这本书写了许多方面,涉及许多问题,现在看来,却没有把其中任何一个问题给讲清楚了,其中许多论点都需要重新思考。但我提出从瞿秋白到毛泽东的文化思想和现代性不同选择的思路,并以葛兰西为参照系,企图从一个国际视野来思考中国现代思想。书中提到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跟中国做了对照和比较,目的就是把中国思想放在国际大语境中来反思,或许对我们今天对中国发展模式、中国文化价值观的思考有些参考意义。倘若如此,这本书迟到多年的中文版就不仅仅是满足文人敝帚自珍的愿望而已,两位年轻学者的辛苦翻译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同仁付出的劳动也就不白费了。

刘康

2011年岁末于上海

序 言

本书以中国为案例,分析了美学与现代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强调了中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者之间的关联、平行与差异。他们来自不同领域,有作家、哲学家,也有政治领袖,近一个世纪持续在历史舞台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而他们之间明显的共同点就是在理论与实践中对“文化”和“美学”的极力强调。本书对于现代中国的审美话语的形成(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传统)进行历史研究,并对包括现代性、现代性的不同选择和后现代性等等更广泛的政治和文化问题作理论的反思。书中提出的核心问题不仅横跨了各种研究领域,而且涉及了一系列的历史和知识传统,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传统。尽管这些问题不是一本书所能全面涵盖的,但书中的各个章节都提醒读者,应关注现代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涉及文化和美学的一些理论和实践上的重要环节。这些环节至关重要,但往往鲜为人知或被忽视。

鉴于“文化”在当代社会与思想中的重要性,我们需要考察这些联系,从而加深对这些分散的、且具有异质性的现代美学传统的理解,并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寻求一种新的选择。正如中国那些重要的思想家们所努力追求的那样,我们有可能从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发现一些不同选

择的文化批评模式。如果读者发现这种研究能够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主要的理论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我将感到十分欣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模式”不会采用某些西方理论那样的方式,自相矛盾地通过推崇差异与他者来宣称自己的普世价值。但是我们依然可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具有超越区域和地理政治疆域的意义。

本书不是一种旁观者式的研究,而是对所讨论问题的介入,也许这种介入是微不足道的。本书试图辩证地对中国理论作历史描述与阐释,同样辩证地思考笔者自己的批评立场。这种辩证思维具有内在的自我反思性,而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者在反思现代传统以及革命遗产与现代性问题的实践中,所运用的正是这种思维方法。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反思资本主义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时候,也运用了类似的思维方法。通过对文化、政治与美学的“反思”的反思,本书反思了历史事件(史料)和概念与范畴(史论)的双重历史性。概念的历史性虽不像历史事件那样明显具体,但史料却要依靠史论才能成为历史图卷。正如“实践”(或历史本身)和“理论”的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是作为“主要矛盾”居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因而将“自我反思”重新嵌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正是重建文化批判方法的一种努力。

本书的主要论点是:文化及文化革命与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建构现代性不同选择的目标是紧密相联的。而审美和文化的问题曾经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们首要的关注对象。就此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多种多样的实践与方案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相似之处。当然,欧美的马克思主义知识传统也是非常多元的,但是除了对毛泽东思想的一知半解之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几乎没有意识到中国人在不同的语境中所做的工作。因此,尽管可以从总体上说毛泽东思想改变了欧洲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思考方式,但是通过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比较,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

中国美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通过赋予文化政治学力量,为批评介入提供了理论空间。欧美的左翼文化政治孕育了一种抵抗主流的批判视

野,主要关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宰制和反抗、操纵和自治、获取共识和强迫手段等问题。与此相反,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使命是双重的,一方面批判革命文化领导权的内在矛盾,另一方面为革命完成后的文化重建提供新的视野。这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价值所在。对于全球性的文化批判来讲,其意义超越了中国本土。此外,作为欧洲以外的理论实践,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对于马克思主义内在的欧洲中心论有着理论的自觉。如果要对这种欧洲中心论提出挑战和质疑的话,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不可忽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及其历史和结构的局限性,都在现实世界的斗争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对这样一个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实践,我们应该重视。

中国马克思主义寻找不同选择的现代性(当然包括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阶段”)不但批判了资本主义现代性,而且还批评了决定论和目的论。和西方现代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一样,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建构这种现代性不同选择的过程中也赋予“文化”以优先权,将其既作为手段,又作为目的。在毛泽东看来,文化革命的功能仅次于农民游击战争,并且是建立和发展革命领导权的关键,也是他的社会主义不同选择的主要特征。然而,赋予“文化”优先权导致了忽略社会生活中其他极为重要的领域,尤其是经济。在革命成功之后,文化革命与革命领导权问题逐渐蜕变为审美和文化生活大规模的政治化和工具化。这严重影响了社会和经济的重建,或者说影响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而在中国不同选择的现代性中,这是另外一个中心目标。毛泽东的文化优先权,开始只不过是对付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方式,结果演变成了绝对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唯文化论”。相对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他给社会主义中国所制定的不同选择蓝图变成了一种包袱,在毛时代结束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毛泽东的思想遗产依然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内遗留了大量极为复杂的问题。

而且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一枝独秀(主要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但事实上正相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立场经常各不相

同。本书分析这些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相互分离的实践,强调后革命社会文化自主空间的建设。毛泽东文化革命和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悲剧性结果迫使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者对其文化优先性原则进行反思,认为它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优先性原则,同时也妨碍了建设性和系统性的社会转型。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尤其是李泽厚的“实践主体性哲学”,重申了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以及物质“实践”和“生产模式”范畴,以与当代文化批评的语言相对应。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者沿着西方马克思主义设定的日程前进。中国学者已经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与毛泽东思想的联系作过批评与反思。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后中国的发展经验和观念方法方面已经绘制出一种不同的认知地图,提供了一种当代文化研究中不同选择的“文化拓扑”。他们提供了一种认知的不同选择,以帮助我们理解现代中国文化史上曾被阐释过的批评概念和概念框架。《马克思主义与美学》用中国自身所提供的理论,从批评的角度考察了这些“文化拓扑空间”,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比较,让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相互碰撞中产生某种思想火花。当然,这还仅仅是一种初步尝试,需要受到历史无情的检验。

本书勾勒了现代中国美学话语的发展谱系。这种美学话语是从德国古典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批评中移植并经过转化和变异而发展起来的。而从整体上来看,西方知识分子除了对毛泽东有所了解之外,对其余大部分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及其思想几乎一无所知。虽然英语世界里知道鲁迅的读者可能多些,但是对像瞿秋白、胡风、朱光潜和李泽厚等名字却非常陌生。然而他们的西方同仁,例如卢卡奇、阿多诺、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等人的名字在当前西方学术界却是家喻户晓。尽管实证主义的“影响研究”模式的可靠性近来备受质疑,但我们如果将“差异”和“不同”绝对化、迷信化,并由此在现代性中排斥内在的张力和矛盾,这也是一种危险的倾向。欧洲和北美学术界中的“领域研究”的学科分工虽然不是当代对“差异”一味迷信化和制度化的结果,却把作为知识对象的

“现代中国”从主流的文化和文学研究中割裂和排斥了出去。中国研究中的主要的二元对立,像现代/传统、西方/东方、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等等,进一步肢解和外化了现代性的内在冲突。这些冲突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作为一种总体模式首先确定下来,而这种模式把所有的不同选择都理解为异端。对中国现代性不同选择中的审美话语的谱系的分析,就是要打破西方这种总体性神话。其途径就是重新恢复这种充满悖论和异质性的经验以及具有多重可能的状态。由于美学的概念具有独特的多功能性和模糊性,所以将现代性中的矛盾本性具体化了。因此,它是一个棱镜,通过审美自身的不断调和,对现代性内在矛盾和结构关系加以检视。这样做既不用把其复杂的内在矛盾笼统地总体化,也不必把多元的内在矛盾外在化。

本书第一章通过对理论和历史问题的总体评述,来阐明核心论点和主要问题,勾勒一个认知性的问题框架,并对当前的历史和文化研究中用以界定和区分“中国”、“现代性”和“文化”等概念范畴的学术体系予以分析。因此,首先有必要对美学与现代性的关系加以讨论,包括美学在18世纪的欧洲,尤其是在德国起源,经过19世纪的发展直到20世纪早期,才出现了现代性不同选择的观念。也就是说,当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从地方性历史经验发展到全球化运动的时候,现代性呈现出碎片化的特点,同时也成为一种普遍化的趋势,这就使现代性具有不同选择的可能性。中国步入现代性的路途无疑构成了一种不同选择,在此过程中文化和美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马克思主义一踏上中国现实斗争的舞台,就把美学从资产阶级的话语转变为一种有力的革命武器。在此之前,美学作为一种资产阶级话语是完全自律的,而且是和社会生活相分离的。因此,美学和政治的关系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美学话语的这种历史性转变的意义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语境中进行评价。在这个传统中,政治(也可以说“文化政治”或“现实政治”)、意识形态、领导权(包括在前革命与后革命社会中的领导权)以及主体性(或者“主体的死亡”)等都成为问题的“核心”。这些问题在当代文化批评中也非常关键,所以有

必要分析 1990 年代与其早期经验之间的关联。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之前,中国那种独特的美学话语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的发展,主要是由其所面对的西方现代性的文化政治所推动的。本书对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等的思想做了简要的分析,因为是他们把美学带入中国现代性的视阈中,并寻求不同选择的现代性。这一分析旨在说明美学和文化在中国的现代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接下来的章节集中讨论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发展。这些章节的结构主要按照历史阶段来划分,从 1910 年代的五四启蒙运动和文化批判直到 1980 年代的文化反思。而在分析过程中则侧重于对这些问题进行阐释。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城市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与农民这两种主要革命力量之间的冲突。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化理论的形成就反映了这种根本性的冲突。革命文化工作由上海(20 世纪初期亚洲最具有国际性的现代都市)向落后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先江西,后延安)转移,而革命胜利后,又返回到城市。这种转换一向是通过现代/传统,或城市/农村的二元对立模式来解释的,但这种二元对立的解释只不过是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内在的矛盾性外在化了。在这里,我们通过探讨鲁迅的否定性和寓言性美学以及瞿秋白对欧化的批判和对民族大众文化的提倡,检验了在现代性全球化历程中政治和文化、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矛盾。我们比较了城市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鲁迅的著作和西方同代人本雅明、阿多诺的作品,以及瞿秋白和葛兰西的方案,因为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人,面对类似的历史条件,各自独立提出的革命战略。

由于在毛泽东思想中,美学和文化处于中心地位,所以葛兰西的领导权和反领导权概念在重新评价不同选择时就非常有用,这主要是由于毛泽东、葛兰西的思想都产生于相似的战略考虑和历史条件。然而,葛兰西的理论思考严重不足,十分模糊。在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中,“形式”或“民族形式”的美学问题是焦点。毛泽东的革命领导权和文化革命方案内容丰富,其中一点是“思想改造”,以农民革命军队为榜样,帮助城市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转变为“真正的”革命者。这涉及大量中国后革命

时期文化和美学的政治化和工具化。但是,从葛兰西的角度来看,他是无法充分考虑这些问题的。因为葛兰西虽然对文化革命问题也有所思考,但是他根本不可能设想一种后革命的文化空间。而且,在探讨后革命社会革命文化建设的关键问题(这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主要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当代西方文化研究对于葛兰西关于共产主义革命战略的大量误读。只言片语地使用“阵地战”和“身份政治”等等来替代商品化和经济不平衡问题,揭示了西方“左派”知识分子非历史性和理想主义的倾向,或者说“后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自由主义的倾向。很有意思的是,后殖民主义批评家用于反对西方的“认知暴力”或“贱民性”等所运用的很多激进的观点和言论,早在1930年代早期和1940年代瞿秋白和毛泽东就已经提出来了。上面提到,后殖民主义借鉴了葛兰西的很多理论学说作为部分置换策略,很难说采用他们的说法对现代中国有什么新意。在中国问题研究上,后殖民主义者自相矛盾地揭露激进的中国革命遗产,在这个遗产中找到了自我的镜像,这种做法只会让真正的问题更加扑朔迷离,让我们对中国革命和革命领导权复杂的遗产更难以把握。

例如,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来自于他对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战略思考,依据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国家)形成的经验。这样的思考可以在胡风的观点中得到阐释,胡风坚持在后革命社会建立一个半自主的、独立的文化空间。在这样的文化空间中,主体或“主观战斗精神”能抵制封建资产阶级的强权和舆论领导权,还能抵抗革命领导权自身的政治工具化。因此,要展开普遍性与中国特殊性的“市民社会”的讨论,就需要对这种认知性构想进行严格的剖析,因为它潜在的理论基础仅仅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经验之上的。

“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后革命中国的出现始于1950年代,以20世纪50到60年代长达8年的美学大讨论为标志,表现为以文化和美学为中心的另外一些有意思的问题,我们将在第四章讨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家最初以马克思主义学院派特别是朱光潜和李泽厚为代表,他们就像当代的西方批判理论家一样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问题具体包括:审美

经验中的主体性问题；文化领域的实践（praxis/practice）问题；人性和自然本性的关系；美学和意识形态的关系。然而，中国美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结论相差甚远。中国美学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依据物质生产进行“实践”（practice）；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无论是存在主义人道主义者让—保罗·萨特，反人道主义的结构主义者路易·阿尔都塞，还是文化唯物主义者雷蒙德·威廉姆斯，都毫无例外地坚持文化和美学领域的“实践”（praxis）来对抗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唯经济论”和“唯生产论”。在西方，主体作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概念遭到了无情的攻击。而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者所赋予它的不仅是主权性的主体和行动者概念中真正富有人性的乌托邦精神，而且还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并且将主体作为一种新的政治身份予以理性化。西方马克思主义长期以来用“异化”作为一个主要口号来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解构和否定性批判，而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使用的“人化自然”的观念，却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者们关于现代性作出的不同选择的远景中的号角。

最后一点不同是，西方的“后现代”争论和中国1980年代的“文化反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意识形态基础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的大动荡时代，以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1968年5月巴黎学生运动为缩影。现在回想起来，80年代的这些争论提出的政治问题和阐释学的问题均陷入一种历史推动的矛盾辩证法，这种历史的辩证法牵扯出了诸如“文化”和“美学”这类非历史和超历史性的范畴，而实际的历史事件和概念的历史性被置换掉了。学界把葛兰西的“过渡期”永久化，用“符号”、“语言”和“话语”以及近年来葛兰西的“贱民”、“宏观政治学”等类似概念偷梁换柱，无限搁置了社会不公平和经济不平等这些明显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中国学者犹豫徘徊于要么积极参与社会改革，要么宣称纯粹“审美”、超越世俗和政治的形而上姿态之间。尽管如此，重要而强有力的理论建构已经从1980年代席卷全球的文化激荡中浮现，给我们提供了方法、概念框架、问题集合，让我们思考历史的关键时刻，并寻找不同选择。